

八
秋
回
顧

蕭紅

人民日報出版社

八 秩 回 顾

萧 风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许 静

封面设计:李继卿

责任编辑:白增华

八秩回顾

萧 风

*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0.75 字数 250 千字

1991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 定价:4.90 元

ISBN7-80002-182-3/G · 35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互助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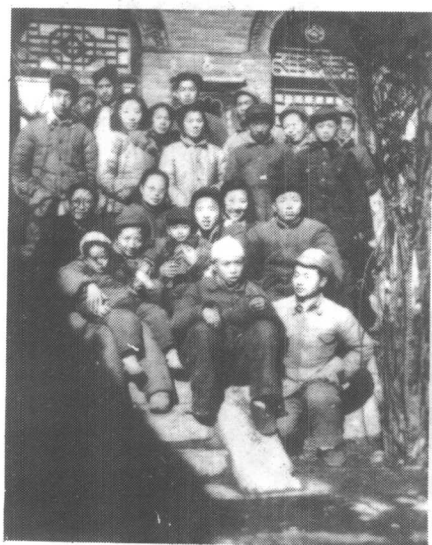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春在苏州
全民流通图书馆门前



一九八三年在太原举行《胜利报》四十五周年座谈会时合影



一九四六年元旦在太行新华日报



一九四八年在邯郸新华广播电台

一九四九年在人民日报
总编辑室



目 次

前言	(1)
----------	-------

上 编

五年间的锻炼

——记 30 年代苏州青年的救亡运动	(3)
--------------------------	-------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文化运动	(7)
----------------------	-------

一份没有保留下来的报纸

——记晋冀豫区的《胜利报》和《晋冀豫日报》	(36)
-----------------------------	--------

山西和顺档案馆里的笔记本

——介绍 50 多块 1/4 的《胜利报》残报	(81)
-------------------------------	--------

太行新华日报两三事

——悼念史纪言同志	(135)
-----------------	---------

红波传真理

——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	(146)
-------------------	---------

保证真理的声音不中断

——回忆接替陕北广播的经过	(163)
---------------------	---------

从邯郸电台到《人民日报》	(170)
--------------------	---------

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的日子里	(176)
----------------------	---------

范长江在陕北的来信	(181)
-----------------	---------

值得借鉴

——记安岗同志从事新闻工作的几件事	(186)
-------------------------	---------

下 编

读文学创作专号	(191)
胜利报民革室的《老实话》	(193)
调查工作的一个基本问题	(214)
东北冶炼厂是怎样贯彻管理民主化的?	(218)
同一个下乡干部谈话后	(226)
倒转过来	(230)
谈谈新闻的“个性”	(234)
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	(245)
知识青年革命化的一条重要道路	(253)
学习共产党员的修养	(257)

附 录

太行抗日根据地新闻、文化记事(1938. 5—1945. 9)	(263)
---------------------------------------	---------

前 言

198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抗战52周年纪念日,也是我80周岁纪念日。为了这个纪念日,辑集了《八秩回顾》。回顾了我几十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参加了中国人民大革命伟大过程的经历。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建设向前进展着。

在《回顾》中,有近年写的《回忆录》,也有几十年中的写作。因为篇幅所限,后者只择取了一小部分,分别编成上、下两编;并将《太行抗日根据地新闻、文化记事》作为“附录”一并付梓。

上编中,有一篇尚未公开发表:《山西和顺档案馆里的笔记本——介绍50多块1/4的〈胜利报〉残报》;有一篇是1990年1月《新闻战线》发表而补充进去的:《范长江在陕北的来信》。

下编中,有30年代的一篇《读文学创作专号》,可以说是我仅存的一篇抗战前的短文;40年代的《胜利报民革室的〈老实话〉》,是抗战初期一系列小言论的辑集;40年代的《调查工作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说调查工作的阶级分析方法的;50年代初次当记者所写的《东北冶炼厂是怎样贯彻管理民主化的?》的通讯,50年代下半期的两篇思想评论——《同一个下乡干部谈话后》、《倒转过来》,还有一篇《谈谈新闻的“个性”》,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后的一篇谈新闻编写的写作;60年代的《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是为倡导艰苦创业而写的;《知识青年革命化的一条重要道路》,是激励青年学生们下乡上山的;《学习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60年代的小言论。这些写作只是我几十年历程中的点滴,作为纪念而编成下编的。

60年代中到70年代的大乱动中,则是“靠边站”,“进牛棚”。

进入 80 年代就离休了。离休后,回首过去,写下了若干篇回忆的文章,散见于苏州、山西、北京等地的报刊书籍上。这些写作,应该是我从事活动的历史记载,相当于我的“自述”;也是我经历的时代的
历史见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都有据可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将是史实。所谓史实,都应该是事实翔实,毫无虚构,不只凭借记忆,还应依靠手边的材料和现存的史料,应该都能受到历史的验证。《太行抗日根据地新闻、文化记事》,则是当时历史的记载。这些史实,也许对现实有参考的价值。

不揣冒昧,谨请指正。

萧 风 1990 年 2 月

上 编

五 年 间 的 锻 炼

——记 30 年代苏州青年的救亡运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激于爱国热情，我在苏州《中报》副刊编辑了《救国特刊》，呼吁抗日。当时我的思想觉悟很低，同时正在吴趋坊同顺典当学徒，苟安于一时，所以并未从此跨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只是在《中报》、《吴县日报》的副刊《吴语》上写些短文、时调等，发泄一些不平之气。直到 1933 年夏，也就是距今半个世纪的 3、4 月间，经过同行吴行烈的激励：“不仅坐而言，还要起而行”；并介绍我参加了苏州世界语学会的世界语学习班；后来，我参加了学会，才算找到了进步、抗日的门径。

当时，苏州有两个比较进步的团体。一个是剧联郑山尊组织的苏州艺社，一个是语联陈世德组织的苏州世界语学会。这两个团体，吸引了苏州一部分学生、店员、工人参加了文艺、世界语和抗日救亡活动。艺社的社员有：朱信学（丁洛）、姜逸萍、谢宗鼎（金东新）、沈毅（孔厥）、陶忆萱等，都是店员。他们业余写作些文稿，投向《吴县日报》的《吴语》。我由陈廉贞的介绍，认识了他们。苏州世界语学会的口号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用世界语”。学会的会员有：杭立、凤永益、张若望、顾文华、伊明、朱海民、王益云、金蕴璋、左怡如、左乐如、陈静如等，还有项志遯、包之静、吴大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小学教员，经常到学会活动，并远足、旅行，叙谈抗日救亡工作。在 1934 年秋末，陈世德、杭立、郭友声、凤永

益、朱海民和我等筹组天明社。学会的会址是租借的金门内景德路的一间楼房，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天明社开会也在这里。

1934年时，我们通过陈廉贞的关系，在《早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取名《绿芽》，十天或半月一次专门宣传世界语，有时还发表些有关抗日的短文、诗歌等。这时，因有艺社社员的合作，《吴县日报》的副刊《吴语》、《早报》的副刊《平旦》（陈廉贞主编），也都陆续地发表些进步、抗日的作品。

1935年1月，天明社出版的《天明》月刊问世。编辑人是我（王苏蜚），发行人是杭立，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第四期刊有反对“新生活运动”的杂文，就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结合久已想破坏学会、天明社的阴谋，由潜伏在学会和天明社里的特务顾暨朱破坏，5月4日在景德路会址将我们11人逮捕，关进监狱，分别于一周后保释和被押解到镇江省监狱。国民党反动派以为奸计得逞，苏州世界语运动和抗日救亡的火焰，从此就可熄灭。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绿色的星星不会沉没，救亡运动的旗帜不会倒下，苏州的进步青年、爱国志士是镇压不了的。就在天明社被破坏后，艺社的姜逸萍、谢宗鼎和陈廉贞仍在继续活动。1935年秋，我们出狱以后，又一起创刊了内容更为左倾的《铁轮》。可惜只出了一期，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

北平学生掀起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爱国救亡巨浪以后，陈廉贞、姜逸萍、谢宗鼎等爱国青年，举行了座谈会，讨论响应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分头把自己起草、印刷的传单，送给了部分大、中学校的学生会，号召起来抗日。

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我们几人——郑山尊、朱信学、田蔚、杭立和我在上海参加了各方面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先是在郑山尊创办的“互助小学”和夜校义务任教，同小学和夜校的师生分别参加了“国难教育社”、“妇女界救国会”和“职业界救国会”，以小学和夜校为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我又参加了

“上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驻会工作；并在鲁迅逝世后，辑译了拉丁化小册子《鲁迅不死》(Lusin Bus)，由天马书店发行。1936年冬，转移到闸北永光小学义务任教。同永光小学的教师和原互助夜校的女生组织业余歌咏队，经常到大陆商场向吕骥学唱进步的抗日歌曲，以及跟随崔巍到“小剧场”排演节目，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秋，陈世德、杭立、朱海民和我等筹组苏州全民流通图书馆，在1937年元旦成立。这个图书馆的书籍，是大伙捐赠的；经费、家具也是大伙捐献的。这是苏州世界语学会、天明社、艺社的爱国青年为了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而组成的。图书馆的馆址就在察院场口的一幢三层楼里。参加图书馆工作的，不仅有常驻的从扬州仙女庙来的俞宗澄(未平)及其妹妹俞惠贞，还有陆续参加义务服务的女工许纯(沙红)和女学生姚慕野、吴棕音，以及朱仲学(朱学)、朱海民(汉明)等。图书馆的进步书籍，另放内部借阅。当时还组织有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歌咏队、戏剧小组、世界语学习班等。参加活动的有路灯剧社的黄埭乡师的学生顾厚栋(顾前)、蒋思安、陆地、鲁鱼、孙路等，还有绸布店、钱庄、银行的店员们，有土地丈量局的小职员黄文华、陈文奎(去非)等。顾文华、彭德贤、陈立平等也经常在这里参加活动。图书馆成了苏州进步青年、爱国志士的活动阵地。

在“七七事变”前后，图书馆曾组织青年们到监狱慰问“七君子”，其后又组织游行，欢迎“七君子”出狱。图书馆还组织一部分读者到盘门外“日租界”青旸地工厂作过抗日宣传。“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图书馆用墙报编辑出版了上海永光小学来苏的师生写的文章，号召全面抗战。“八·一三”以后，歌咏队扩大为抗日宣传队，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的部分人员组成“抗日救亡座谈会”，陈廉贞、朱信学、顾文华、姜逸萍、谢宗鼎、蒋思安和我，分别领导歌咏队、救护队等组织，为抗日伤病战士服务和宣传抗日。俞宗澄、姚慕野、朱海民、朱仲学、陶忆萱等还到过我们组织的唯亭工学团所在地的唯

亭镇等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抗日宣传队活跃在苏州城内外的各个角落，雄壮的《义勇进行曲》、口号声、歌声响彻苏州城市的夜空。

抗日救亡的巨大浪潮，冲击着苏州的进步青年、爱国志士，在苏州沦陷前后奔赴各条抗日战线。如今回忆起来，这五年间风风雨雨的锻炼，鼓励着我们走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道路，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60年代中期起，又经受了10年动乱的考验。现在，有的年已七八十，有的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黄文华、姜逸萍），有的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顾前）。我们这一伙幸存者散处在天南海北，各自为共同的理想，祖国的四化，继续贡献自己的晚年余热。

（原载《苏州报》1983年11月20日，1988年10月修正）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文化运动

太行山区东至平汉路，西至白晋路，北至正太路，南至黄河边，是日寇在 1939 年“七月扫荡”和闫锡山在 1939 年“十二月政变”后，从晋东南广大地区分割出来的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 年初，这块狭长地带，又沿邯（郸）长（治）大道分成太北、太南两个地区。直至抗战后期，才又扩大、统一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山西闫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以后，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晋冀豫区党委等机关，都驻扎在太北地区。晋东南文化教育救国总会的会址，也已由山西沁县辗转移驻辽县麻田镇。

（一）

1939 年 5 月 4 日，文教总会在山西沁县南沟成立。7 月，第一次反“扫荡”后，迁到辽县下口村开展工作。据 1939 年 10 月 13 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晋东南文教总会，为开展文化工作，已迁到辽县一带工作。”“各救联合会也已经迁驻辽县。从 1939 年 9 月 1 日起，已将各救联合会的‘白晋路东办事处’改为‘晋东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太行山办事处’。”

当我 1940 年 1 月下旬从十八集团军总部到太行区党委分配到“文总”的时候，驻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很少。主要负责人有：总务秘书王玉堂同志；负责组织部工作的郝汀同志；负责研究部工作的石蕾同志；编辑部有石蕾同志的爱人杜伦同志。我到“文总”以

后,就参加了研究部的工作,同时参加了编辑《文动》的工作。

“文总”成立之初,确定的工作方针是:一、促成文化统一战线,使本区文化人、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群策群力,以特殊武器贡献抗战;二、推动组成各文化团体,各级文化组织,以组织力量进行推动工作;三、对敌进行有计划有领导的宣传战;四、发展深入的大众文化运动,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推进识字运动,提倡义务教育,辅助政府实施文化教育政策;五、提倡理论研究;六、沟通敌后方与我后方的文化工作。5月15、17、27日,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文总”的工作纲领。这个纲领提出了“文总”的“工作原则”。这些原则是:一、一切为着抗战,服务于抗战的;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三、民族特性、习惯传统的;四、大众化、地方化、通俗化的;五、战斗的,创造的,与实际生活体验的;六、与群众训练、动员、组织密切联系配合的。同时提出了工作任务:一、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坚定持久抗战与晋东南抗战必胜的信念;二、创造提高与发展抗日的民族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三、广泛开展宣传战,粉碎敌伪欺骗宣传;四、协助政府,协同其他宣传教育出版机关,组织宣传出版委员会,推动、统一并巩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五、推动并协助各文化团体,开展并充实其工作;六、团结各级文化教育工作者,组织各地文教救国会;七、普及社会教育,扫除文盲,健全学校教育,发展充实新闻出版事业;八、开展敌占区的宣传教育工作与争取敌伪军的工作。具体的工作,有关于教育部门,新闻出版事业,艺术工作,沦陷区的宣传教育等的原则和工作要求。

同时,出版了机关杂志《文化动员》,油印,三十二开本。在1939年先后出版了九期,由陈默君、蒋弼、王博习等编辑。

“文总”成立不久,制订了《反汪除奸宣传周宣传要点》,在6月3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宣传要点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揭露敌人一贯“以华制华”的阴谋和汪逆精卫投敌叛国的事实:一、日寇的政治进攻与军事侵略并行;二、“以华制华”就是利用汉奸破坏

我民族团结；三、汪逆恰作了日寇的御用品；四、汪逆对近卫声明，作出了应声虫的态度；五、汪逆叛国的经过；六、汪逆已为祖国群众所唾弃；第二项是揭穿汪逆精卫叛国投敌后的卖国阴谋：一、汪逆卖国条约的中心内容是：“倒蒋反共”，颠覆国民政府，要求日寇在中国整军计划未完成前，迅速进攻大西北大西南，再度狂炸我各城市及乡村，统一伪政权，汪逆出任的政府总裁，日寇每月津贴汪逆300万元；二、这个条约完全反映日寇的要求，完全适合于日寇进攻中国的战略，而且汪逆已在步步执行中；三、但这完全是日寇和汪逆的梦想，我们能够打破日寇进攻和汉奸阴谋，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第三项是宣传的方法及其内容：一、揭破敌人一贯“以华制华”的阴谋及汉奸卖国贼的欺骗宣传；二、揭穿汪逆精卫叛国投敌的罪状；三、严厉制裁汉奸卖国贼与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说服教育落后、顽固分子；五、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六、实行全国精神总动员。

7月，经历了第一次反“扫荡”，“文总”转移到辽县下口村。12月，又经历了闫锡山蓄意发动的“十二月政变”，转移到辽县下麻田镇。

从1939年5月4日“文总”成立，到1940年2月“文总”转移驻地、安定下来的10个月间，晋东南的文化活动，处于动荡不定的局势之中。负责“文总”工作的同志们，陈默君、刘稚灵、高咏、蒋弼、王博习等分散各地，尤其是陈默君、蒋弼两同志调到鲁迅艺术学校工作，因此，《文动》在1940年3月复刊时，作编辑工作的已经只有杜伦同志和我两人了。

(二)

1940年初，正是“十二月政变”后不久，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整顿巩固，“文总”的工作，也刚刚恢复。

当时，“文总”的工作重点是：团结太北区文化人、知识分子抗日救国，反对汪逆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反对顽固势力破坏抗战，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

根据上述工作重点，“文总”在当时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组织文教团体，动员文化人抗日救国；二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三是编好《文动》，从思想上动员文化人、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对敌斗争。

在组织文教团体、团结文化人抗日救国方面，1940年春，主要是成立了太北区文化运动委员会和新闻界、戏剧界的文化组织。据《文动》第10期（1940年3月出版）《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团结文化人运动》一文所说：“在目前客观形势的紧急需要上，在统一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团结文化人运动，是当前每一个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与文教会员的中心工作之一，而成为决定文化教育运动发展的中心环节。”又据同时《为统一太北区文化运动而斗争》一文所说：“统一太北区文化运动，是当前太北区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正如《胜利报》在2月16日社论中所说：“在严重发展的投降危机中，逆流正向文化力量进攻，每个文化工作者都要清楚认识自己的神圣工作，是敌人和投降妥协派最仇视而欲毁灭之才甘心的。同时，也是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妥协派和动员、团结知识分子参加抗战的最有力武器。为适应紧急形势与工作发展，统一太北区文化运动，建立坚强文化堡垒，是当前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由于统一太北区文化运动的重要而急迫，组织全太北区的统一文化运动的组织如剧联、报联等等，就非常需要了。这些组织，可以互相协助，互相联系，成为战斗的坚强堡垒。因此，《胜利报》的太北报业问题座谈会，太行山剧团的努力于统一剧运，我们认为，在这基础上，一定能够建立起统一太北区文化运动所需要的报联与剧联的统一组织。并且，在太北区有着战斗历史和光荣成绩的《胜利报》与太行山剧团，也一定能够胜利地团结全太北的报业与剧团